

余光中、霍松林看安庆

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在散文《塔》一文中,回忆了他与母亲同登安庆的旅痕。

第二次大战后,他和母亲乘汽船,顺长江东下。船泊安庆。母与子同登佛寺的高塔,俯瞰江面的密樯和城中的万户灰甍。塔高风烈。迷蒙的空间晕眩的空间在脚下,令他感觉塔尖晃动如巨桅,而他是一只鹰,一展翅一切云都得让路。十九岁的男孩,厌倦古国的破落与苍老……

文中有三个问题需要说明:一是余先生与母亲到安庆的时间。余先生这篇文章写于1965年6月17日,并明确提到到安庆是20年前,按照余先生的推算,他19岁到安庆的年份应该是1947年。

二是登上的安庆“佛寺高塔”的名称,余先生在此文附注道:“事隔二十年,已忘塔名。”好在有一位叫周弃子的读者在读过余文后,即投书道出塔名。现节引《文星》第九十三期的编者附记:“安庆江边的那座寺和塔叫迎江寺振风塔。这是我的朋友廖寿泉告诉我的,他是安徽望江县人,在安庆住了很久。”

三是对安庆的印象,余先生的《塔》写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南部一个叫葛底斯堡的自治村镇,他在《塔》文中联系地写道:“安庆到葛底斯堡,两座塔隔了二十年。立在这座钢筋的了望塔上,立在二十年的这一边,他抚摸二十年前的自己,自己的头发,自己的幼稚,带着同情与责备。世界上最可爱最神秘最伟大的土地,是中国。踏不到的泥土是最香的泥土。远望岂能当归,岂能当归?”余先生是以一位异国游子的身份,不是对安庆一地进行具体的描述,而是站在乡愁的高度,感叹“世界上最可爱最神秘最伟大的土地,是中国”。这就一切都在不言中了,因为也包括安庆这片“最香的泥土”。

巧合的是,在余先生莅临安庆的两年后,国学大师霍松林先生也来到安庆。霍先生写于1947年的《旅途纪历》,在其“怀宁两日”一节中涉及安庆的见闻。按霍先生的前后文及文后的附记推算,霍先生是公元1947年2月15日下午3点抵达安庆的。先节引此文:

(十五日)到了怀宁,因为当天不开船,遂花了三四个钟头,逛遍了所有的街市。只有一两条大街,建筑也非常简陋,而且生意萧条。繁华之区,倒是些古老而狭长的街道。东门外的迎江寺殿宇巍峨,有高达七级的迎江塔,一层层的攀上去,直到顶端,纵目四顾,不但

怀宁城了如指掌,与天相接的大平原,也全入眼底了。

十七日,风雪交加,与陈君逛大街,以五千五百元购胡开文小楷鸡狼毫三枝,大楷羊毫两枝,墨一锭,……下午吃油炸包子十枚。

对读余、霍两文,我想阐释的是:余、霍两位先生来安庆,同是坐船,顺江东下。不同的是,余光中游的是塔,霍松林游的不仅是塔,还游了街。从霍先生“花了三四个钟头,逛遍了所有的街市”看,实事求是地说,其时作为安徽省会的安庆城也的确呈现出某种简陋和萧条感,这种感觉也程度不同地呈现在民国的其他文人眼中。

民国其他文人看安庆

据郁达夫写于1922年2月的自传体小说《茫茫夜》,写的就是他1921年在安庆的安徽法政专门学校任教时的亲身经历,其中就有侧面对安庆古城的感受。

……看见格子窗一格一格的亮了起来,远远的鸡鸣声也听得见了。过了一会,有一部运载货物的单轮车,从窗外推过了,这车轮的仆仆仆的响声……沿了长江,过了一条店家还未起来的冷清的小街……人力车就折向北去。车并着了一道城外的沟渠,在一条长堤上慢慢前进的时候……看看东边,以浓蓝的天空作了背景的一座白色的宝塔,把半规初出的太阳遮在那里。西边是一道古城,城外环绕着长沟,远近只有些起伏重叠的低岗和几排鹅黄疏淡的杨柳点缀在那里。他抬起头来远远见了几家如装在盆景假山上的草舍,看看城墙上孤立在那里的一排电杆和电线……

从郁达夫的文中描写看,其时的安庆,真不像一个省城,倒像一个集镇。而1914年就在安庆生活、读书,1919年负笈远游,1930年重返安庆执教安徽大学的苏学林先生,不但在自传体散文《我的学生时代》中明言安庆是:“斗大的江城。”还在回忆安大的同事朱湘(安庆太湖县人)一文中持续这种观点:

斗大的安庆城只有百花亭圣公会有点西洋风味,绿阴一派,猩红万点,衬托出一座座白石玲珑的洋楼。(《我所见于诗人朱湘者》)

同时在安大执教的诗人朱湘,也对斗大的安庆城流露出倦怠的情绪。他在1930年6月3日写给友人罗念生的信中,这样评论安庆城荒芜的精神文化生活:

安庆这地方无聊之至,电影院都没有,有一个大戏班子

坏透了。

必须说明,在郁达夫、苏雪林、朱湘这些从日、法、美归来的留学生眼中,看安庆如小米斗,但对长期生活在乡下或小县城的人来说,安庆就“是一个令人向往的远不可及的大城市”。如1937年暑假,年仅15岁的舒芜从桐城考入安庆高中,激动地看见“安庆有电灯,有‘洋楼’,有热闹的长江码头,江边有当时我心目中认为最阔气的旅馆,还有几条柏油马路”,这一切让少年的舒芜深信安庆无愧为“大城市”(《忆安庆》)。

随后日寇大举侵华,1938年2月9日,不得不举家乘船逃向武汉的曲学大家卢前先生,路见夜色下的安庆已是满目疮痍,“冷清的街市,两边店家多已关门。”此时安徽大学已经停办,而师友胡小石、潘伯鹰的家眷还在安庆,却无处探寻。让曾在1927年秋天执教安庆的卢前先生“痴痴地望着安庆”,发出“这寂寥的都市,难道忘掉了当日如火如荼的情况”之问?(《炮火中流亡记·寂寥了,安庆!》)

而到了1945年的抗战胜利之后,安庆简陋和萧条的局面也没多大改观。导致站在振风塔上的余先生,发出对“古国的破落与苍老”之叹。而几乎“逛遍所有街市”的霍先生,也发出“建筑简陋,生意萧条”之叹。真像鲁迅《论“费厄泼赖”应该缓行》一文所写的那样:“秋瑾的故乡也还是那样的故乡,年复一年,丝毫没有长进。”

这里要枝蔓一下,就在卢前船泊安庆的1938年,一个时年8岁的小女孩已经雏凤新声,“呀得呀得喂”地把黄梅调唱得有声有色,她就是后来家喻户晓的黄梅戏大师严凤英。却少人知道,卢前和严凤英后来还是姑表亲。

这得从严凤英流落到卢前的故乡南京说起。

卢前和严凤英是“姑表”亲

1950年春的南京,20岁的严凤英在“友艺集”京剧茶座,一见如故了时年32岁的南京“甘家大院”的三少爷,也是戏曲行家的甘律之;随后树上的鸟儿成双对,甘律之和严凤英在甘家大院筑起爱巢。虽然他俩于1954年才正式结婚,但此时已是事实上的夫妻。

从甘律之的家世看,那可是“谈南京掌故不可不及”的书香门第、金陵望族(卢前《冶城话旧·津逮楼》),祖上还曾建起著名的藏书数

十万卷的“津逮楼”,可惜1853年毁于战火;还是丝竹不绝、唱腔绕梁的戏曲世家,连京剧大师梅兰芳、曲学大师吴梅等人都曾是甘家的座上客。而此时可谓“唱得梨园绝代声”正是甘律之的父亲——甘贡三。而甘贡三青眼相加这位极具戏曲天赋的儿媳,亲自传授严凤英京剧和昆曲,让她在甘家接受良好的戏曲训练,为她后来成为一代黄梅宗师打下坚实的基础。

从卢前来说,甘贡三不但是他的姑父,还是戏曲的忘年交。作为曲学大师吴梅门下的第一高足,卢前不但会唱曲、还会度曲,更留下《散曲史》《中国戏剧概论》《词曲研究》等一系列著作,成为戏曲研究的扛鼎之作。另外,甘律之的大哥甘南轩、二哥甘涛又是卢前的学生(卢前《冶城话旧·津逮楼》)。

从亲戚层面说,甘律之就是卢前的姑表弟,而严凤英自是卢前的姑表弟媳。我想常到甘家大院的卢前应当见过严凤英,严凤英也会亲切地向年长她25岁的卢前喊一声表哥。说不定卢前还会对严凤英的戏曲略做指点。可惜1951年,47岁卢前就英年病逝于南京,他既没有看到四年后的1955年,严凤英在黄梅戏电影《天仙配》上饰演七仙女而一举成名,妇孺皆知;也没有看到1968年4月7日,38岁的严凤英英年自杀而永远离开心爱的人世;更没有看到如今——

崛起的安庆

1958年9月16日视察过安庆的伟人毛泽东,早在1950年10月写的《浣溪沙·和柳亚子先生》词中深情吟道:“长夜难明赤县天,百年魔怪舞翩跹,人民五亿不团圆。一唱雄鸡天下白,万方乐奏有于阗,诗人兴会更无前。”如今,古老的安庆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,文化之邦、戏剧之乡、禅宗胜地、投资热土,先后荣获全国文明城市、中国特色魅力城市等荣誉称号。满怀激情的安庆人正以勤劳和汗水建设更加美好的明天!

若上文中的各位先生在天有灵,能魂返安庆这片“最香的泥土”,面对“天翻地覆慨而慷”的安庆城,我想他们发出的不再是“厌倦古国的破落与苍老”之句,而该是由衷吟出伟人之句:“萧瑟秋风今又是,换了人间!”

总之,民国文人看安庆,多是惊鸿一瞥,寥寥数语,但却是安庆发展的珍贵史料,它的意义不容小觑。



月光城 随笔

民国文人看安庆

蒋华